清史纂修

服务清史编纂　抢救文化遗产 推动清史研究
——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出版成果述评

王俊义

中华民族既有辉煌悠久的历史，又有易代修史的优良传统，一部部代代相传、彪炳史册的《二十四史》就是明证。同时，历朝历代的修史，既遵循一定的史观、叙例和方法，又都十分强调对史料的采集、整理和运用。清代著名史论家章学诚曾谓“抑古今史书，岂有外于文书档案而为凿空之文者欤”。[①]同样，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在编委会工作伊始就再三强调“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方能窥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而不能构建于虚无缥缈之中”。[②]惟其如此，国家清史编委会在制订清史编纂工程的规划中，便将编辑出版国内外之清代有关的档案与文献资料，作为清史编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设立了有关的专业组与出版组，以及时出版各类图书。日前，我们从《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出版成果目录》中获悉：从 2003 年 7 月至 2010 年 12 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已出版了各类图书 130 余种、2000 多册，总字数达 10 亿字之上，且大多为首次公开出版之极珍贵的清史资料。这些图书的出版，迅即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肯定，不少学者认为作为国家重大项目的新编《清史》，期望能成为“一部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有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③]但尚有待于其最终完成后，由学术界做客观、公正的科学鉴定。不过仅就编委会目前已出版的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而论，足已嘉惠学林，传之永远，有功当代，利在千秋。那么清史编纂工程究竟出版了哪些图书？为什么受到那么高的评价？其在服务清史编纂及推动清史研究方面究竟发挥了什么价值和作用？这就有必要对清史编纂工程的出版成果有关情况及其价值略加述评。

一、根据清代史料涵盖的范围与特点编辑出版五种《丛刊》

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历史，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终结，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前面是集大成，后面是大变局”。这样的社会历史属性，使之与此前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有明显区别，亦使清代史料涵盖的范围有突出特点：

其一，清代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终结，乃

[收稿日期] 2011 - 05 - 26
[作者简介] 王俊义（1937—），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教授；北京 100021

封建社会的集大成时期，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极致。致使其在各方面遗留下的档案与典籍都极为丰富和完备，而且由于其所处的历史时空距现代较近，多保存至今。

其二，清朝是由满族贵族为统治主体的一个朝代，也是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进一步统一巩固的历史时期，其在保持满族特性，开发边疆地区，及各个民族作用的发挥方面都很突出。故在保存的历史文献资料方面，不仅有汉语的，也有大量满、蒙、藏、回、维吾尔……等各个民族语言的历史文献资料。

其三，从明清之际大量西方传教士来华，到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传教士、外交使节、商人、记者、旅行家等，纷纷来华甚至久驻，并各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写有大量与清史相关的报告、著述、书信、日记等资料。甚至形成宝贵的历史档案，至今流存于欧美日各国。

其四，清朝作为社会转型期，其在保持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特征外，并逐步产生了近代社会的新的增长点，且在经济发展、思想文化、国际交往、科学技术与城乡建设等方面都有所反映。有不少近代社会的增长点，在旧与新、中与西的冲突交融中，产生了一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的文化典籍乃至实物史料。

其五，从世界史角度看，自 16 世纪西方世界步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后，整个世界逐渐融为一体，各国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中国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国际社会，世界也更加关注中国。1949 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 30 多年来，西方各国的学者，超越传统汉学模式，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新视角、新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人日益增多，清史几乎是国际中国学研究的热点，涌现了许多清史研究的论著，值得中国清史学界参考借鉴，也是清史史料采集的范围。

从对清代历史的社会属性及其史料范围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清史史料具有数量大、范围广、语种多、庋藏散，以及“新、旧、中、西”杂陈的特点。戴逸先生曾经说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④]是很有道理的。而今，我们既然是以国家名义编纂继“二十四史”之后的一部高标准、高质量的清史巨著，就不仅是要在思想理论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而且在史料的吸收运用方面，也必须有新的拓展与发掘，即使是难以“竭泽而渔”，也应最大限度的广搜博采，编委会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特成立了几个相关的专业组，并相应设立了“档案”、“文献”、“图录”、“研究”、“编译”等五种《丛刊》。由专业组和《丛刊》组成编委会，广泛联系国内外储藏有清代史料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再组织约请各方面的专家整理、编辑、翻译成各类图书，而后由出版组纳入规划及时出版。

这里，不妨进一步将五种《丛刊》的设立及已出版的主要图书略予评介。

《档案丛刊》：清代档案是编纂和研究清史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新修《清史》能否超越前人，向前推进，关键就在于是否充分利用了档案资料，因此成立了档案组并设立了《档案丛刊》。该丛刊针对清史编纂的需要，已编辑出版了《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清代中南海档案》、《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总汇》、《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又有存放于地方的档案《清代四川巴县衙门档案史料选编》、《清代吉林省馆藏清代档案选编》。还将出版已立项的少数民族文字档案，如《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清代喀喇沁蒙古档案译文选编》等。这些档案大多为第一次公布的原始史料，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文献丛刊》：有清一代的学术文化繁荣兴盛，学派林立，文人辈出，学者文人留下的著述汗牛充栋。仅《清史稿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收入的清人著述就有 74951 种。[⑤]然而这些著述此前大都未能整理出版，但这些著述中包涵极丰富的清史资料，是编纂和研究清史时不可或缺的。为弥补以往之不足，根据清史编纂的需要，该《丛刊》组织编辑了大量清人之全集、文集、笔记、日记和稀有的稿本、抄本。现已出版的如《李鸿章全集》、《张之洞全集》、《康有为全集》等。文集也已出版不少，如《翁同龢集》、《黄遵宪集》，特别是《清代诗文集汇编》，其中收录作者 4000 余人，著述 7000 余种，乃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清代诗文集

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并予分装800巨册出版。还有些清人日记，如《恽毓鼎澄斋日记》、《越缦堂日记》、《薛福成日记》等。同时还编辑出版了多种大型史料汇编，如《清代蒙藏回部典汇》(75册)、《清代缙绅录集成》(95册)、《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23册)、《清代稿钞本》一辑、二辑、三辑(每辑都是50册)，等等。

《图录丛刊》：在中国传统史书中，叙事记人均以文字记载，而现今新编《清史》，鉴于清史与清代史料的特点，将图录作为体例创新之一部纳入编纂范畴，拟将留存于世的大量绘画、舆图、人物像、券证等编入《清史》。为此，特设立图录组与《图录丛刊》。目前已出版的此类图书有《帝国掠影：英国访华使团画笔下的清代中国》、《券证遗珍：天津市馆藏清代商务文书图录》、《满铁旧影：旅顺博物馆藏满铁老照片集》、《耆献写真：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清代人物图像集》，还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清代建筑图像及清代彩绘地图等。

《研究丛刊》：为了鼓励学术创新，开展学术研究中的百家争鸣，以期在清史编纂过程中，不断发现和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拓展和深化清史专题研究，设立了《研究丛刊》，以及时出版清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日前已经出版的有：龚书铎主编《清代理学史》(上、中、下三册)、来新夏《清人笔记随录》、郭松义、定宜庄《清代民间婚书研究》、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还有虞和平主编《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喻春龙《清代辑佚研究》，以及台湾学者陈捷先《蒋良骐及其〈东华录〉再研究》、陈万鼐《〈清史稿·乐志〉研究》等二十余部。上述《研究丛刊》中，既有学养深厚的资深清史专家的扛鼎之作，也有学界新锐的成名论著，在清史各领域的专题研究中多有新的突破性创见。

新修《清史》必须有世界眼光，不仅要将清史置于世界历史范畴中予以分析、研究和评价，而且应放眼世界，博采、积累世界各国关于清代历史的记载形成的档案文献，还应参考吸收其研究清史的有益成果。为此而设立编译组与《编译丛刊》。几年来已组织翻译这方面的资料与著述达40余种。其中既有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有关早期汉学奠基之作，诸如[法]李明《中国近事报道》、[葡]安文思《中国新史》；也有晚清时期长期在华工作的[英]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收入赫德在长期担任晚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所著有关"中外贸易"、"条约制度"、"中国内政改革"等方面的论文多篇。就赫德的身份地位而论，这些论文当有很高价值。与此书相类似的还有[英]李提摩太的《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该《丛刊》还翻译出版了当代西方各国许多清史名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如[美]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论》、[日]森田明《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以及[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这些国外学者的清史论著，大多是在国际清史学界颇有影响的名著，学术研究总要知己知彼，将这些著作翻译出版，对中国学者研究清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除上述已出版的五种《丛刊》的各类图书外，为给清史工作者提供检索之便和及时了解国外研究清史的新信息、新动向，在已有出版成果中还编译出版有《1945—2005年台湾地区清史论著目录》、《1971—2006年美国清史论著目录》，及多本《清史译丛》。

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已经出版和将要出版的大量成果，无疑会有助于清史编纂工作，也必将推动国内外的清史研究，特别是那些卷帙浩瀚的历史档案与历史文献必将流传久远，沾溉将来。

二、为新修《清史》提供大量翔实、准确的史料，有裨于提高《清史》纂修质量

历史科学发展的客观进程表明，无论是浩大的修史工程，或者是能传之后世的史学名著，都必须有充分的史料根据，都需要在史实上有新的发掘，否则很难有所突破和创新。一百多年前中国殷墟甲骨文的发掘，使殷商史建

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北洋军阀时期纂修的《清史稿》，之所以被后人诟病，除立场观点乖谬偏颇外，未能充分利用清宫档案及其中外清史资料也是重要原因。有鉴于此，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设立了前述五种《丛刊》，以搜罗中外清史资料，使清史编纂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基础上。几年来的工作实践证明，清史编纂工程的出版成果，在服务清史编纂方面的确发挥了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编委会在五种《丛刊》设立后，曾明确要求参加修史的专家要尽可能阅读和利用这些资料。譬如档案是纂修清史最直接最重要的依据，只有充分利用档案，才有可能在质量上有大的创新。因要求参加撰修清史主体工程各个项目，在按规定上交其史料长编中，使用的档案资料不得少于三分之一。无论是项目的撰写，或者是对已有成果的评估，都对是否利用了档案资料有一定的要求。如传记组就要求"所有参加清史传记撰写的学界同仁，都要重视档案资料，并尽可能全面检索"，"要使用档案来建立人物事迹的基本框架"。典志组不仅要求对有关志书的撰写一定要利用档案，甚至在评估项目成果时，若发现某些成果未利用关键性的档案则不予通过。由于有这些要求，已经公开出版的《档案丛刊》的纸质图书，都放置于编委会的图书资料室，修史专家可随时阅读。对有些已经立项编好而尚未出版的档案，也尽可能在编委会设立的"中华文史网"上公布，以便于专家及时查阅，通过有关调查访问，不少修史专家和海内外清史研究工作者的确大量阅读利用了清代档案。

根据编委会档案组的调查和统计，清史编纂工作经过立项已编辑整理公布在"中华文史网"上的档案，利用的人数和利用的档案类别都在不断增加，"仅从 2008 年 1 月至 2009 年 5 月，清史纂修人员网上阅览档案图像的就达 211544 人次，平均每月 14000 人次，目录阅览 90345 人次，平均每月 5314 人次;检索利用 36488 人次，平均每月 2146 人次"。[⑥]

纂修清史的专家们与清史研究工作者，通过对已经出版或经整理立项于网上公布档案的查阅和利用，为所编写的项目补充了大量新的史料，并勘正了已有史书的不少讹误。这在主体工程"典志"、"传记"、"史表"的一些项目中都有很多例证。如《灾赈志》是新修《清史·典志》之一志，专家们在修编此志"史料长编"或撰写书稿时，就充分利用了在编委会立项的档案项目——《清代赈灾档案史料汇编》。在他们编写并向编委会提交的《清代赈灾资料长编》，就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来自此项档案，并根据这项档案为该志的撰写奠定了基本的史事框架。据《灾赈志》项目主持人夏明方教授说"过去研究灾赈的主要资料来源多是有关《实录》、《文集》、《地方志》和《清代荒政书》等，但这些史书对灾赈的记载或失之过简，或有所遗漏，或过于零碎分散，因而难于搜检与集中，而现在编辑整理的《清代灾赈档案史料汇编》有关灾赈的史料却比较系统、完备、准确。这项档案对于编纂《清史·灾赈志》有重要作用"。夏明方教授还概括说明这些档案的作用"一是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清代灾害及其社会影响的基本情况"；"二是有助于更深入地探讨清人官赈的基本情况"；"三是有助于更为系统地分析清代仓储的基本情况"[⑦]。

档案史料对勘正已有史书上的讹误也有重要作用，如史表组在核查项目时，发现已有史籍对川陕总督博霁死亡时间的记载为"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乙亥"。然而在有关档案中却明确记载，早在此年九月前的几个月，博霁的灵柩就已运至京城。因据档案订正了对博霁死亡时间的讹误。档案史料对人物传记的撰写也帮助甚大。因清代朱批奏折中包含有大量的人物活动信息，内容真实又详细具体，目前在《清史·传记》中列选的人物多能在档案中找到资料。对此，编委会传记组组长潘振平先生曾具体列举了昭梿等清代人物，在《清史稿》、《清史列传》及《清实录》中的有关记载，或语焉不详，或记载有误，却可根据档案即以补充和勘正。据此，他进一步说"这批档案在传记撰写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比如不少传文利用谢恩折、到任折等建立传主的履历框架，显然比依据实录旧传更为可靠。不少传文利用相关奏折与其他资料互证，记述传主的事迹言论更加准确、具体和丰满。"[⑧]

除《档案丛刊》和公布在中华文史网上的各类历史档案资料外，浩如烟海的清人著述也是清代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史编纂工程的出版成果中，由文献组组织编辑的《文献丛刊》尤以成果多、数量大、价值高而突出。其出版成果总字数已达八亿字以上，其中大部分是清人著述，包括文集、笔记、日记、函札、奏疏等。由于这些著述的作者，大多是清廷的中枢权臣，或封疆大吏，或博学鸿儒，或文坛宗主，又大都是许多清朝政治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以其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笔之于书，其内容涉及清代政治、军事、文化、教育、艺术、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都是纂修清史的第一手重要历史资料。这里仅以几部规模最大的全集——《康有为全集》、《李鸿章全集》、《张之洞全集》为例，说明其在清史纂修中之史料价值。

康有为乃晚清史上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思想家和学者，其作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代表人物及戊戌变法思潮的领袖，著述宏富，影响深远。但学术界、出版界过去对其著述的整理出版，或为单本专著，或为作品选本，如政论文选、诗文选 、书信选等，而没有全面、系统、综合、完备的全集。复旦大学的姜义华、张荣华教授，应清史编委会之约请，积多年搜求而编成的《康有为全集》，将康有为一生的诗文著述、代表性的学术专著、书信、奏折、游记等编成近千万字全集，其中不少从国内外搜集的未刊稿，成为截止目前最为齐备的康有为著述全集。这对于全面研究康有为的思想及撰写新的康有为传乃至研究晚清政治变革、思潮发展、文化更新等，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学术资料价值。

李鸿章是晚清史上一位极重要的历史人物，其既担任过多省的巡抚总督，又是朝中办理洋务、处理外交关系的权臣，从他一生的经历可窥中国近代的发展历程，是研究晚清史不可绕开的人物。然而，过去对他著述的整理却极不完备，又有明显的缺陷，如吴汝纶编的《李文忠公全书》，对大量的李氏文献未予收录，而且对部分原稿有意改删，失其本真。而今由顾廷龙和戴逸先生主编的《李鸿章全集》，共 39 卷，约 2800 万字，较吴汝纶所编约 600 万字的《李文忠公全书》超出三倍多。全集将李氏著述分为奏议、电报、信函、诗文等四大类。其中囊括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等收藏单位的大量未刊稿，所收录未刊文稿资料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均为研究李鸿章的重要文献。从而使本书成为目前规模最大、内容最完备的《李鸿章全集》，当然是进一步全面、客观、公正的研究评价李鸿章的根本依据，也为纂修《清史·通纪》咸丰、同治、光绪各朝历史增添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张之洞亦是晚清重臣，他久历封疆与中枢，晚清许多重大史事他都参与其间，也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由赵德馨教授主编之《张之洞全集》，是一部 12 卷、1200 万字的鸿篇巨制。该书以北平文华斋 1928 年刊刻的《张文襄公全集》为底本，进行辑佚、考证、标点、校勘，共收录文献 14453 件，比原底本多 7802 件，较之前几年河北版的苑书义教授主编之《张之洞全集》也多出 3473 件，同样是研究张之洞以及研究晚清史的重要史料。

除康有为、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全集》外，《文献丛刊》已经出版或将要出版的清人著述还有恽毓鼎、陈宝箴、黄遵宪、薛福成、翁同龢、汪中、祁寯藻、丁日昌、袁世凯等人的《全集》、《文集》、《藏札》等个人著述与档案，大都发掘了新的史料资源，为清史编纂和清史研究在开拓利用史料方面做出了贡献。

另外，《文献丛刊》出版的几部大型资料汇编，诸如《清代缙绅录集成》、《清人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清代蒙藏回部典汇》，以及《中国荒政书集成》、《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等，都分别为研究清代人物、官制吏治、农业经济、赈灾救荒等专题研究提供了较为系统完整的资料，这些资料或为新的发现，或系统整理公开出版，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作用。特别是由章开沅教授等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一书，乃是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史学会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卷之后，有关辛亥革命史史料的又

一系统的资料新编，这部八卷本的新编进一步发掘搜集了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其中包括了国外的珍贵档案，如日本外务省档案、法国外交部、陆军部的档案以及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为更加深入、全面地研究辛亥革命史提供了大量新史料。今年又适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国内地与台湾、香港、澳门都将举行隆重的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这部资料新编的出版就更加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至于《图录丛刊》的出版成果，对服务清史纂修的效能更是自不待言。由于新修《清史》中，设有《图录》卷，《图录丛刊》就是直接为《图录》卷服务的，已经或将要出版的《图录丛刊》的各种图书，都为《图录卷》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图片资料，在编纂《图录》卷时，当可经过甄别整合，选择补充和录用。

《研究丛刊》在国家清史编纂工程中的出版成果中可谓独树一帜，其不同于主要编辑整理历史档案、历史文献与国外译著的其他几种《丛刊》，而是以组织审定出版新的清史研究成果为主。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二十多种研究论著看，内容涉及清代政治、经济、学术思想、民族宗教、婚姻习俗、外交礼仪、人物研究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大都是经过该《丛刊》编委会认真严格审定选择的力作，有很高的学术质量和研究水平。对有关选题的研究多具开拓创新、填补研究空白的学术价值，不仅为清史纂修积累了研究成果，也拓展和深化了清史研究领域，活跃了学术研究氛围，有助于清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鉴于这些著作多是单本学术专著，便于阅读，读者特别是清史界同行，当能慧眼识珠，这里恕不一一评述。

《编译丛刊》遵循纂修清史要有世界眼光的指导原则，在编译工作中克服了专业翻译人员难求、与原作者联系不便、解决版权授予繁琐等困扰，短短几年竟翻译出版了 40 多种世界各国、各地有关清史的资料和研究论著，使得清史编纂工程能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既拓展了史料搜集范围，吸收运用了国内某些短缺的史料，也能及时吸取国外有益的研究成果。这 40 多种图书，大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如法国耶稣会士李明撰写的《中国近事报道》，于 1696 年在巴黎出版后，四年间竟再版五次，还被 译成英、意、德文出版。后来由于教廷的礼仪之争，使此书成为禁书，被封尘近三个世纪，直到 1990 年才得以重新面世，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这还是第一次。该书作者以书信体裁，将自身在华经历写信通报给国内要人，而后汇编成书，这些书信以其在华多年的亲身经历，对康熙年间中华帝国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内容涉及中国的民族、战争、宗教、语言、风俗、气候等各个方面，为欧洲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在欧洲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书中对康熙时发生的乌兰布通之战的记述，还弥补纠正了中国史籍的遗漏与失实之处。乌兰布通之战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战事，康熙十分重视，派了裕亲王福全（康熙之兄）为抚远大将军及恭亲王常宁（康熙之弟）率军出征，大臣索额图、明珠及国舅佟国纲等也随同参战。蒋良骐在《东华录》中记载有当时福全给康熙的奏折 “未时交战至掌灯时，大败之，斩杀甚众。”此后的史书包括现今学者的清史著作中关于乌兰布能之战的论述也多据《东华录》，认为清军取得大捷，甚至“大获全胜”。但是在《清圣祖实录》中对这次战事却只字未提。戴逸先生最近在《〈清史·通纪〉撰写大纲（一、二、三卷）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乌兰布通之战时，曾说多年来他对有关史籍对此次战事的记述总是心存疑团。他感到清军既然取得大捷，为什么福全带兵回京时，康熙却并不庆贺迎接，反谕令其驻兵朝阳门，不得入城，还革去福全的亲王、罚俸三年，从此不得带兵打仗，而且参与战事的索额图、明珠等都受到惩罚。他认为这些迹象表明，一些史籍的记载恐有失实，却一直未发现证据。然而，当他读到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时，却有豁然开朗之感，李明书中说到这次战事时说 “皇帝派兄专征鞑靼（按:即准噶尔蒙古），鞑靼军瞄准战机，及时出击，以少胜多，打败了王者之师，官兵全面败北，溃不成军。福全回北京，康熙亲自审讯他战败之罪。福全向康熙自请死罪，康熙不客气地说，你要死就该死在战场上。”从李明的这

些记述看，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原来是打了败仗，福全却谎报军情而讳败为胜。这才能合理解释福全回京后的一系列遭遇。戴逸先生据此分析《清圣祖实录》对此次战事只字未提，乃是雍正朝修康熙朝《实录》时，采取了讳败不言之笔。而蒋良骐在修《东华录》时，使用了福全给康熙的讳败为胜的奏折，将战争失败的真相掩盖。然而李明作为外国传教士，当时身在北京，了解到战事实情将之记入其书，他没有任何必要把所谓的“胜仗”硬说是败仗，他的说法应该可信。这一事例说明在西方人的一些著作中，反而能弥补中国史籍的疏漏与记载不实之处。

在《编译丛刊》中一些关于晚清时期历史的译著，也同样有重要史料价值，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所著《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此书作者可为晚清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他从1870年来华，先后在山东、山西各地传教赈灾，后于1890年应李鸿章之聘任天津《时报》主笔，1891年又到上海，为广学会总干事，与晚清史上的李鸿章、张之洞、恭亲王奕䜣，以及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重要人物都有交往，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许多重大事件，并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在台前幕后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调停外交，抨击革命。其一生经历几乎就是一部中国晚清史的缩影。将其以在华四十五年经历写成的《回忆录》与相关史料记载相对照，无疑令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里发现不同的说法与记载，有参证互补之效用。

这里，还有必要提到《清史译丛》，考虑到国际学术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们编纂和研究清史，绝不能关起自己家门自说自话，而应开门修史，搭建与国际学界对话交流的平台，及时了解分析借鉴国外清史研究的学术思潮，研究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及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和作者，为此，编译组还编辑了《清史译丛》，现已出版九辑（九册），每辑都设有“专题研究”、“论著”及“论点选题”、“名家访谈”、“理论争鸣”、“学术综述”、“新书评论”等栏目，这些内容对于清史编纂工作及国内专家学者了解国外清史研究的动向与趋势大有助益。

三、抢救历史遗产，开发文化资源，推动清史研究的长远进步和发展

从1644年顺治入关建立全国性的清朝政权起，历经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各朝，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封建帝制被推翻，直至1912年清帝退位止，这268年有清一代的历史，经历了兴、盛、衰、亡的全过程，已然烟消云散成为过去，永远不再复返了。但是后人对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研究却永远不会结束，且永无终止。事实上从清朝灭亡之日起，对清朝历史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今天纂修新的大型清史，不过是对过去一百多年清史研究的发展和总结。即使是这次的清史编纂工程圆满完成，势必开启清史研究的新阶段，清史研究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向前推进。因而，在清史编纂过程中出版的各种《丛刊》，既要着眼当前，也要考虑未来，正如戴逸先生所说“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弘扬历史文化遗产”。[⑨]也就是说，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网罗搜集的各种史料，编辑的各种图书，不仅只是服务于清史编纂，还着意于抢救历史遗产，开发文化资源，避免许多稀见史料尘封和流失，以免造成无可挽回的、难以弥补的损失。

正是基于上述长远的考虑，在清史编纂工程的出版工作中，遵循编委会的设想和计划，我们对保存在国内外尚未整理出版的清史资料，对一些学者多年编辑整理的富有价值的图书，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出版，均采取积极措施，予以扶植，以便尽快问世；或通过各种途径，尽可能抢救和开发。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以达到进行整理并尽可能出版、抢救、开发之目的。

如前文提到的康有为、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全集》，都是总量达千万或数千万字之上的鸿篇巨制，其学术史料价值不可估量，而且各书的主编和参加整理的成员，大都是硕学

鸿儒、海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往往以十年、数十年的心思精力，不为名、不为利，多方奔走，广为搜集考证，埋头苦干，以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来编辑整理这些图书资料，但由于整理工作繁难，出版经费量大，以至于或整理工作进展迟缓，长期难以杀青；或因出版经费拮据，久久不能出版，学术研究无法利用。譬如十二集的《康有为全集》，早在 1982 年即列入经国务院批准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近代人物文集之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87、1990、1992 年陆续出版了第一、二、三集。此后作者又先后编辑整理了后续各集，原出版社却迟迟未能出版，为此，作者又得到康有为之故乡广东某出版社的允诺出版，而将书稿转去，但因该出版社的人员变动，此书的出版又予搁浅。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后，知悉上述情况后，将《康有为全集》视为对清史纂修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历史文献而列入文献整理项目和《文献丛刊》，并为整理者创造必要的条件，给予一定的项目整理经费，给出版社一定的出版补助，同时商得原出版社的同意，改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整理者对原出的前三集重新增订，对其余各集又进一步修改补充，终于在 2007 年将十二集同时出版。[10] 由于此书的史料价值和整理质量都很高，于 2008 年荣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像《康有为全集》这样的出版事例，还所在多有。

在清史编纂工程已出版或将要出版图书中，有些确带有抢救历史遗产，开发文化资源的价值。如已出版的《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是清代道光至宣统间（1821—1911）的粮价抄档，囊括了清代 21 个行政省域内各府、州、县各种主要粮食的价格。是研究清代经济史极富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的珍贵史料，乃由中国经济史学者在 20 世纪 30 年代整理列表，珍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图书馆，除少数学者研究利用外，为多数人所不知，很难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这次国家清史工程启动后，作为清史文献整理项目，由经济史专家认真整理，对存疑之处依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原始粮价单逐一计算核对，标出了原表中数千条错误，印装成煌煌 23 巨册的图书公开出版，极便于学者研究利用。此书出版后，荣获第三届（2010 年）国家图书大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这是国家对几代经济史学者和清史工程文献整理工作的肯定和鼓励。

再如《清代蒙藏回部典汇》，乃清末曾在清廷蒙藏院任职的吴燕绍（1868—1944）先生一生的心血结晶，他为了巩固民族团结，破灭帝国主义的分裂图谋，利用任职的条件，用了五十年的时间（1894—1944），从东华四录、圣训、起居注、上谕、奏章、军机密档等各类文献中，辑录的有关蒙古、西藏、回部（新疆）三个地区的各种资料编纂而成。该《典汇》纪事起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迄清宣统三年（1911），以年、月编次，涉及政治、经济、地理、史事、军事、外交、风土、人情、宗教等各个方面，有极高的史料与文献价值。此书整理者十分珍爱自己这一心血结晶，然书未面世，便在抗日战争时抱恨而终。书稿由其哲嗣民族地理学家吴丰培保存，吴先生在多年的辗转流离困境中，什么东西都可以舍弃，唯抱着此稿不放，总期望有朝一日能出版问世。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早年研究边疆地理，与吴家父子均有交往，深悉此稿的价值，他认为有清三百年的边疆大事就保存在这部书中。解放以来，他多次建言呼吁此书能公开出版，却始未如愿。

直到此次清史编纂工程启动后，才将这一有极高价值的书稿列入文献整理项目，经吴丰培先生进一步加工整理，以影印形式，精装 75 册予以出版，终于实现了老一辈学人的夙愿。由于中国在清代得以进一步统一和巩固，清代在治理边疆民族方面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如“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而不易其宜”的“因俗而治”方针等。而该书则为研究民族、边疆以及清政府的政策策略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可以想象如果此书稿仍一直保存在私人手中，年深日久，很难保证不毁坏遗失，将之开发和出版，才能永留人间。

清史编纂工程中已经列项的存放于各地方的清代档案尤具抢救意义。如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藏南部县档案，上起顺治十三年（1657），下迄宣统三年（1911），时间跨度长

达256年，几乎涵盖了有清一代的历史，是四川南部历任正堂履行职责、执法行政的官方文书，是清代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县衙门行政管理活动的翔实记录，涉及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宗教、文化、教育、外交等诸方面。史料价值极高，有“地方文献宝库”之称。[11]数量众多，内容丰富。1960年被发现时，存放于地方公安局，有100多捆，4000多卷，由于年深日久，加之保管不善，有些档案原本已被虫蛀，或粘连、发霉。如不引起重视，加以整理，妥善保管，必将更加损坏，甚至成为废纸。进入改革开放之后，清史研究日趋活跃，该档虽引起当地重视，拟改善保管条件，予以陆续整理，然限于人力、物力和技术条件，仍有重重困难。直到清史工程启动，编委会档案组经过调查，列入档案整理项目，还派了专家对整理工作予以指导，才逐步以科学的分类整理，并进行数字化处理，待条件成熟予以出版，供清史研究利用。

总而言之，清史编纂工程出版成果的价值和作用，无论是服务于当前的清史编纂，或者抢救历史遗产，开发文化资源，都是无庸置疑的，特别是从清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而言，则更具有推动清史研究的不断进步和长远发展的价值和作用。因为从中国通史各个断代史研究的状况看，清史研究较之于其他各断代史的研究还是一个相对薄弱和年青的学科，学术界对清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不像其他断代史的研究时间长，底子厚、成果多。辛亥革命前后，因推翻满族贵族封建帝制的革命需要，对清朝的历史批判的多、否定的多，以客观的态度科学分析的少。全国解放后，将整个清代历史划分为前后两截，鸦片战争前的清史是古代史的尾声，不管是讲历史课，或者是搞研究，到清朝就草草收兵。至于对鸦片战争后的晚清史被称之为近代史，教学和研究都是以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为主线，而非全面、系统、细致的研究整个清代社会。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清史研究才有突飞猛进的长远发展。研究的人多了，研究成果也多了。加之，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了一定的财力基础，才有今天以国家名义来纂修《清史》，这对清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无疑是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但大型《清史》的纂修绝非是清史研究的终结，而是将清史研究推向新阶段的起点。即使是新修《清史》不负重望，成为“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巨著，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也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产物，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思想的演变、观念的更新，研究方法的转变，价值取向的变化，清史研究也必将不断进步和发展，甚至对同一材料，也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因而，如何借助几百年一遇的国家修史的大好机遇，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多用些气力，多下点功夫，尽最大可能，最大限度的网罗清代历史文献，多出些有价值的图书资料，避免那些无价之宝在我们这一代或继续束之高阁，无法利用，或任其虫蛀风蚀，眼睁睁使之损坏流失。庶几才能不负于今人，无愧于后人。我想这大概也是以戴逸先生为主任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设立“档案”、“文献”等五种《丛刊》编辑、翻译出版国内外清史图书资料的良苦用心。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由于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出版的成果，在服务清史编纂、抢救历史遗产、开发文化资源、推动清史研究的长远发展和不断进步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因此在这些成果问世后，既受到国家有关领导、有关方面的鼓励肯定，也获得海内外学界的赞扬和认同。2004年4月，当史晓风先生整理的《恽毓鼎澄斋日记》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后，曾送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审读，温总理不仅很快阅读，而且于同年6月1日即亲笔致信作者说 ‘所赠《恽毓鼎澄斋日记》收到，大示亦读。这部史料的整理出版，反映出先生的勤奋、缜密、敬业之精神，也可以见到先生深厚的文学功底。我喜欢读古人日记，觉得日记的记载较为真实，读了既可以史为鉴，又可以他人之历练、操守、见识激励自己。”温总理如此亲切地肯定了整理者的治学精神，也高度评价了包括《恽毓鼎澄斋日记》等古人日记的价值，对清史编纂工程的文献整理工作也是莫大的激励。再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康有为全集》和《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作为清史编纂工程的文献整理项目，都先后荣获国家图书大奖——中华优秀出版物

奖。这也是国家对辛勤整理这些著述的学者和清史文献组的肯定。更为可喜的是，由清史编纂工程《研究丛刊》组织编审、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清代理学史》（上、中、下三册，龚书铎主编；史革新、李帆、张昭军著），最近还荣获第二届中国政府出版奖，这是国家设立的新闻出版行业的最高奖，而且这次评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肯定此书是"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反映了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文化积累和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成果"。[⑫]

整个清史编纂工程的顺利开展以及大量清史图书资料的出版，在国际上也备受关注，引起强烈反响，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居蜜女士（国民党元老居正先生之孙女），曾多次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访问，与清史编译组的专家交流座谈。由于她长期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对国会图书馆所藏中文善本图书了若指掌，目前她正在主持一项将馆藏中文善本数字化的项目，此一项目的"汉语记忆"平台通过数字化加工，将许多包括绘画等稀见作品做成图文兼顾、声情并茂的三维展示平台。居蜜女士希望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合作，提供源流、版本最好、内容价值最重要的图画等"感知"文献，在"汉语记忆"平台进行数字化加工，配合清史主体工程的各个类目。

国内许多著名历史学家、清史专家对清史编纂的出版成果也都给以肯定和鼓励，如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在《康有为全集》的出版座谈会上热情洋溢地说"《康有为全集》的出版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是清史出版的一大盛事"，又说"该书的前三卷（上世纪）80 年代就出来，研究戊戌变法史，第四卷是大家盼望的，可那一卷就是迟迟不出来，所以大家都在那里翘首等待，直到今天才看到《康有为全集》的全部，所以，我们也要感谢清史工程和人大出版社所做的努力"。清史专家、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教授，在看到清史编纂工程的出版成果后，也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说："以前查资料很困难，有许多资料都要去手抄，现在很多书都出了，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编委会把资料送到我面前，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条件"。[⑬]冯尔康教授的这番话也反映了清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心声。

---

①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学例议下。
② 戴逸《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文献丛刊〉总序》，载《涓水集》，北京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71-472 页。
③李岚清《统一思想 团结协作 努力把清史编纂工作做好》，此文为作者于 2003 年 1 月 28 日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光明日报》，2003 年 3 月 13 日。
④戴逸《涓水集》，第 472 页。
⑤参见陈桦《文献整理与清史编纂》，载《清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
⑥⑦⑧参见邹爱莲《目前清史工程中的档案利用》，载《清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
⑨戴逸《涓水集》，第 472 页。
⑩见姜义华、张荣华《康有为全集·出版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 页。
⑪参见《南充市档案局（馆）档案项目调研报告》，载《清史编纂通讯》，2008 年第 11 期。
⑫见《光明日报》，2011 年 3 月 18 日。
⑬见《清史编纂通讯》，2010 年第 6 期。